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本期要目

- ◎ 楚人源于关中平原新证
——以清华简《楚居》相关地名的考释为中心
- ◎ 板楯蛮（賁人）源流考略
——廩君之后还是「百濮」先民？
- ◎ 历史时期大清河系变迁研究
——兼谈与白洋淀湖群的演变关系
- ◎ 赋役制度与政区边界
——基于明清湘鄂西地区的考察
- ◎ 近代靖边县治迁徙再研究
——陕北沿边地方政区治所与城址选择关系的个案讨论
- ◎ 宋代安南使节广西段所经路线考
- ◎ 《明代驿站考》陕西驿站补正
- ◎ 清代灞桥建修工程考论
- ◎ 高斌《南河图说》与乾隆首次南巡研究
- ◎ 《晋书·地理志》县级封国考论



2012 2

目 录

楚人源于关中平原新证

- 以清华简《楚居》相关地名的考释为中心 周宏伟(5)

板楯蛮(賁人)源流考略

- 廩君之后还是“百濮”先民? 王晓天 黎小龙(28)

从西蒙古草原到华北平原

- 明朝忠顺营源流考 周 松(39)

历史时期大清河南系的变迁研究

- 兼谈与白洋淀湖群的演变关系 石超艺(50)

赋役制度与政区边界

- 基于明清湘鄂西地区的考察 孟凡松(60)

近代中国港城关系变迁简析(1916~1936)

- 以相对集中系数为例的分析 武 强(70)

近代靖边县治迁徙再研究

- 陕北沿边地方政区治所与城址选择关系的个案讨论 李大海(82)

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国期刊网》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

宋代安南使节广西段所经路线考 廖 寅(95)

《明代驿站考》陕西驿站补正 刘景纯(105)

清代灞桥建修工程考论 史红帅(118)

高斌《南河图说》与乾隆首次南巡研究 席会东(132)

《晋书·地理志》县级封国考论 姚 乐(143)

东魏北齐时期邯郸县设治考

——以《窦奉高墓志》为中心 冯小红 关会芳(151)

南梁始建秦州考 邢东升(156)

· 本刊启事 ·

来函照登 罗 凯(49)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季刊)

ZHONGGUO LISHI DILI LUNCONG

2012年第27卷第2辑(总第103辑)

Competent Authorities: National Educational Ministry

Sponsor: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Editor: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Chief Editor: Hou Yongjian

Publisher: Center for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orthwest China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Date: 2012-4-10

Tel: 029-85303934

Fax: 029-85308547

E-mail: zglsdllc@snnu.edu.cn

Printer: The Second Printer House of Xi'an Jiao Tong University

Overseas Distributor: China International Book Trading Corporation

(P.O.Box 399, Beijing, 100044, China)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

编辑: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编辑部

(陕西师范大学校内, 710062)

主 编: 侯 甬 坚

出 版: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

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出版日期: 2012年4月10日

电 话: 029-85303934

传 真: 029-85308547

电子信箱: zglsdllc@snnu.edu.cn

印 刷: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印刷厂

国内发行: 本刊编辑部发行组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100044)

ISSN 1001-5205



9 771001 520002

刊号: ISSN 1001-5205
CN 61-1027/K

国外代号: Q1126 定价: 20.00元

高斌《南河图说》与乾隆首次南巡研究

席会东

(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所, 陕西西安, 710069)

〔提 要〕雍正年间黄河河政管理制度的变化, 推动了清代黄河图绘制内容和机制的变化; 而康熙年间张鹏翮所绘河渠水利图集的内容和形式, 也影响了乾隆年间江南黄运河图集的编绘。海内外分别收藏有以江南黄河、运河、洪泽湖、淮河工程为主题的河渠水利图集——“南河图说”, 经考证均为乾隆十五年(1750 年)江南河臣高斌、张师载等人在乾隆帝首次南巡的背景下绘制呈送的定本、副本或后人摹绘本。《南河图说》既是河督高斌反映河情、陈述治河政见、彰显治河政绩的工具, 也是乾隆帝确定南巡路线、了解河务、进行河政决策的重要依据。《南河图说》的绘制、呈奏和运用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乾隆首次南巡的模式, 对研究乾隆南巡和乾隆朝河政运作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南河图说》 高斌 乾隆南巡 河政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 (2012) 02-0132-11

〔收稿日期〕2012-01-12

〔作者简介〕席会东(1981—), 河南巩义人, 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所讲师, 历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地图史、城市史、中欧交流史研究。

黄河治理事关清朝漕运畅通与京师国库供给、沿黄数省财赋安全与社会稳定, 是清朝国计民生之所系, 与之相应的河工是维系黄河安流、漕运畅通的国家重要工程, 河政是清代历朝政府的重要施政内容, 而黄河图的绘制运用则是清代皇帝、朝臣与河臣沟通河务、治理河患、处理河政、修治河工的重要手段和依据。

康熙年间黄河河患的中心在江南, 靳辅、于成龙和张鹏翮等河督都把黄河治理重点放在江南段。康熙之际, 黄河河患中心开始从江南向河南推移, 从而引起河政管理制度的变革。雍正二年(1724 年), 清廷任命稽曾筠为河南副总河, 专管河南河务, 雍正四年起又兼管山东黄河, 改变了清代顺康年间由一个河道总督管理黄、运两河的格局。雍正七年(1729 年), 清廷正式分设江南河道总督和河南山东河道总督, 江南黄河(简称南河)、河南山东黄河(简称东河)正式分治。河政管理制度的变革, 推动了黄河图绘制机制和河图类型的变化, 乾隆年间出现了一系列由江南

河道总督绘制的江南黄、运河图集。

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北京大学图书馆分别收藏有一套以江南黄河、运河、洪泽湖、淮河水利工程为主题的河渠水利图集——“南河图说”, 其内容和形式相似, 经比对考证都是乾隆十五年(1750 年)江南河臣高斌、张师载等人在乾隆帝第一次南巡的背景下绘制呈送的河渠水利图集或是其摹绘本。《南河图说》水利图集既是河臣高斌等人汇报河务、陈述治河政见、彰显治河政绩的工具, 也是乾隆帝安排南巡路线、了解河情河务的重要资料, 在清代乾隆朝的河政管理、乾隆南巡运作中具有重要作用。

目前学界对于河渠水利图等地图和图像史料的发掘、运用和研究尚且不够充分, 对本文所涉及的《南河图说》则仅有海外所藏部分图影的披露和描述性著录, 相关著录并未考证出此图集的绘制者及其所涉及的人物、史实与相关制度背景, 对该图集绘制年代的判定不够精确, 所给

定的图名也不够合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两套图集，迄今为止尚未有学者进行研究，收藏者给定的图名不够准确；而且海内外三家机构所藏的三套舆图之间的关系尚未有人发现或论述。乾隆朝河督高斌治河绘图的史实、《南河图说》与乾隆帝首次南巡之间的关系尚未有人进行研究发掘。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舆图史料本身、相关的水利文献、乾隆南巡史料、清实录、河臣高斌的奏折档案等一手史料，探讨海内外所藏三套《南河图说》的内容与源流，考证其绘制者与准确的绘制年代，分析三套舆图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梳理《南河图说》所涉及的高斌等河臣的治河史迹，分析《南河图说》在乾隆帝首次南巡中的运用方式，探讨《南河图说》的绘制与运用机制。最后，本文将归纳与评析《南河图说》在清代地图史、河政史上的价值与影响。

一 海内外所藏《南河图说》 之内容与源流

康熙年间河督张鹏翮所编绘的《治河全书》开创了河渠水利图集的形式，乾隆年间出现了一批深受其影响的专题水利图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乾隆前期的《南河图说》和乾隆中后期《黄运湖河全图》。《南河图说》是江南河道总督所经管的黄河、运河、洪泽湖、淮河水利工程图集，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被高晋辑入《南巡盛典》之中，并有多幅绘本及刻本传世。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地理与地图部、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分别收藏有一套以江南黄、运、湖、河水利工程为主题的彩绘本河渠水利图集，参照该时期的其它舆图并结合清代舆图的命名通例，将其命名为《南河图说》较为贴切^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黄纸套装的彩绘绢本“河工杂图”一套，共20幅，不注绘者与绘制年代，每幅大小相同，均为纵横0.23×0.42公尺^②，即23×42厘米，该套图集每幅舆图各具图题。根据清代舆图的收藏制度与现在收藏地点判断，这二十幅地图原为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的藏图。

美国国会图书馆地理与地图部藏有一套著录为“乾隆黄河下游闸坝图”的图集，该图集为纸

本彩绘，共有20幅地图叠装成册，每幅舆图纵横29×29厘米，各具图题，并附有帖签图说。图集描绘清代黄河与运河交汇地区至海口河段的堤、坝、闸、埝情况；及大运河与长江衔接的扬州府属瓜洲和镇江府属京口地区，山岭、河流、城池、祠庙、埽工等自然地理要素和人文地理要素皆详细显示。黄河涂黄色，其它河、湖皆绘成青蓝色。图说用红签墨书，贴于每幅图上，描述康熙皇帝有关此段黄河修治的御旨，历届河院主持兴修黄河堤坝的始末及乾隆朝新修情况。曾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审阅并著录此图的李孝聪先生认为，图中帖签记载的最晚年代为乾隆十四年（1749年），又根据帖签中有“杨家庄运口系康熙四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南巡指示改挑……迄今五十年利赖无疆”之语，推断此图绘制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或稍晚时候^③。

李孝聪先生对此图的著录描述较为详细精当，而对于此图绘制时间，笔者认为帖签中所记“迄今五十年”只是概数，不一定是确数，也未

^①“南河图说”即“江南黄河图说”。从清代地图和河政、漕政等实际情形来看，江南分为江苏、安徽两省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过程。与多数学者认同的康熙六年（1667年）完成分省不同，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的《皇舆全览图》、雍正七年（1729年）的《皇舆十排全图》、《十五省小总图》和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的《乾隆内府舆图》等清廷三大官方实测地图中，都只有江南省而无江苏、安徽省。就河图而言，无论是清代雍正年间的《天下舆图总折》、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的《梦图荟萃》、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梦图荟萃续编》等图目，还是清代档案、奏疏、水利专著中，往往有“江南黄河图”或“南河图”之称，故笔者据此将此图命名为“南河图说”。

^②国立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初编》，（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第38—40页。

^③李孝聪：《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40页。此段著录亦可参见李孝聪：《古地图上的治河保运工程与淮安——兼倡议淮安市建立古地图与河运工程博物馆》，《“运河之都——淮安”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年，第49—52页；李孝聪：《中国传统河工水利舆图初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邓广铭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802—803页；李孝聪：《黄淮运的河工舆图及其科学价值》，载《水利学报》2008年第39卷第8期，第949—950页。

必一定是康熙四十二年（1703 年）整整五十年后的乾隆十八年（1753 年），完全有可能是乾隆十八年（1753 年）之前的几年间绘制的，这一点笔者会在后文中详细考证。另外，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图上钤有朱文篆体满文的印玺，可以确定是清代河道官员绘制存贮之图。

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藏有著录为“运河图”的河图一套，该图集为纸本彩绘，由 17 幅地图和 20 幅图说叠装成册，一图一说，表明图集原有舆图和图说各 20 幅，但其中三幅舆图已经散佚。舆图每幅 23×24 厘米，图说每幅 20×21 厘米。现存的 17 幅舆图各具图题，每幅图的方位标注于图幅的四缘。各图幅均采用平立面结合的鸟瞰式形象画法，详细而生动地绘出江南河道总督所管的黄、运、湖河道水利工程及相应地域内的河流湖泊、城市聚落等自然地理要素和人文地理要素，其中的黄河绘为黄色，其它河湖等涂青蓝色。总体来看，“运河图”显然不能概括此图集的全部内容和特征。

图集后附有河臣奏议，卷尾注有“东轩高斌、西锦张师载奏辑”，可知此图集原本系高斌和张师载绘奏之图。据北大图书馆藏“运河图”首页《京口江工图说》空白处的题识：“此册乃河道至要，有人得此，不可弃之。嘉庆十三年，随两淮盐政任，曾任内务府郎中、三品参领松寿，追求江南河道形象，敬绘一册，预为自效朝廷。不意中道未遂其志，乃命也”。图幅中多处钤有朱文篆体“松寿”印玺。图中的题识字体明显与图幅中图题和注文的字体不同，不似出于同一人之手；但图题本身的全部文字字体相同，系出自同一人之手。综合来看，此图集应是嘉庆十三年（1808 年）松寿任两淮盐务时所摹绘或题写。而松寿曾任内务府郎中，有机会接触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之图，此图集可能是根据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也即前文所述今第一历史档案馆之图摹绘而成的。

三幅图集的对照见表 1：

从二十幅分幅舆图的内容来看，三套图集主要描绘江南黄河、运河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洪泽湖、淮河的闸坝、埽工、木龙等水利工程。按照内容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江南运河相关的工程图，基本按照运河流程从北往南排列；第

表 1 海内外所藏《南河图说》对照表

第一历史档案馆 “河工杂图” 每幅 23×42cm	美国国会图书馆 “乾隆黄河下游闸坝图” 每幅 29×29cm	北京大学图书馆 “运河图” 每幅 23×24cm
《禹王台图》	《禹王台图》	《禹王台图》
《十字河竹络坝图》	《十字河竹络坝图》 (残)	《十字河竹络坝图》
《骆马湖图》	《骆马湖图》(残)	缺
《朱家闸引河图》	《朱家闸引河图》	《朱家闸引河图》
《九里岗埽工图》	《九里岗埽工图》	《九里岗埽工图》
《刘老涧石坝王营减坝图》	《刘老涧石坝王营减坝图》	《刘老涧减水石坝王营减水石坝图》
《盐河图》	《盐河图》	《盐河全图》
《杨家庄运口图》	《杨庄运口图》	《杨家庄运口图》
《清口运口图》	《清口运口图》	《清口运口全图》
《御坝木龙图》	《御坝木龙图》	《御坝木龙图》
《洪泽湖图》	《洪泽湖图》	《洪泽湖全图》
《高宝各坝下河图》	《高宝各坝下河图》	《高宝各坝下河全图》
《芒稻河归江各路闸坝图》	《芒稻河归江各路闸坝图》	《芒稻河归江各路闸坝图》
《瓜洲江工图》	《瓜洲江工图》	缺
《京口江口图》	《京口江工图》	《京口江工图》
《三滚坝天然坝蒋家闸图》	《(三)滚坝天然坝蒋家闸图》	《三滚坝天然坝蒋家闸图》
《毛城铺减水坝图》	《毛城铺减水坝图》	缺
《王家山天然闸图》	《王家山天然坝图》	《王家山天然闸图》
《峰山四闸图》	《峰山四闸图》	《峰山四闸图》
《黄河海口图》	《黄河海口图》	《黄河海口图》

资料来源：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初编》、李孝聪：《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藏“运河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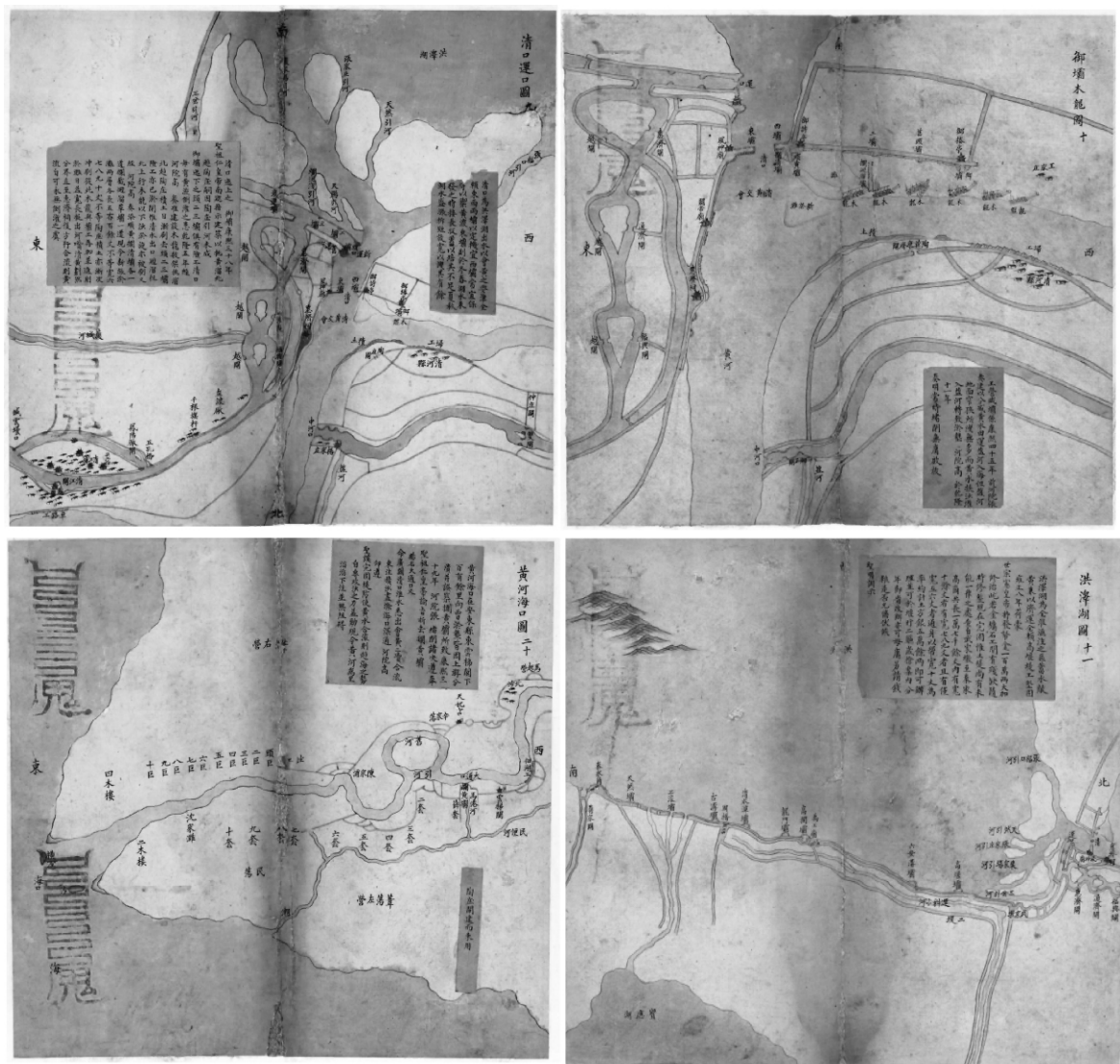


图1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南河图说》之“清口运口图”、“御坝木龙图”、“洪泽湖图”、“黄河海口图”

说明：美国国会图书馆地理与地图部地图数位 ID 编码：g7822ym gct00233

二部分是江南黄河相关的工程图，同样按照从北到南顺序排列。其中的《禹王台图》、《高宝各坝下河图》与张鹏翮《治河全书》中的《禹王台泉图》、《下河图》主题和内容基本相同。经过比对发现，三套图集的形式和图上内容基本相同，明显属于同一作者、同一时代绘制或根据同一舆图原本摹绘的系列舆图集。三套图集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乾隆黄河下游闸坝图”所附文字为红色帖签形式，图右上角注图名和序号（参见图1），《骆马湖图》和《十字河竹络坝图》两幅图仅残存一半；而北大图书馆藏《运河图》所附文字均不是标注或者帖签附于图上，而是将河臣上奏的奏议附于图后，而且其中的《骆马湖图》、《瓜洲江工图》和《毛城铺减水坝图》三图已经佚失。北大图书馆藏《杨家庄运

口图》与一档馆藏图的图名一样，与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略有差别，北大图书馆藏图中有几幅图名较为冗长。北大图书馆藏图和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图中的注文也不尽相同，一些用语也有差异：如美国国会图书馆藏《黄河海口图》上注有“大通口”、“拦黄坝”字样，加盖篆体满文关防大印（参见图1），而北大图书馆藏图上没有上述注记和印玺；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图中提到河臣时用“前河院靳”、“前河院张”、“河院高”等语汇，而北大图书馆藏图则用“前河臣靳辅”、“前河臣张鹏翮”、“臣高斌”、“臣顾琮、周学健”等语汇，更进一步说明北大图书馆藏图是根据内务府舆图房所藏的进奏本摹绘而成的，而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图中的语气如“河院高”等称谓则明显不是呈奏给乾隆帝御览之绘本。从绘法上来看，北

大图书馆藏图中的山脉、建筑画法较为简略，图中还屡有错别字，都表明其是一套摹绘之图。

总体而言，三套图无论从图幅内容、文字内容以及表现地域上，均基本相同或相似，即使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也应该存在摹绘关系。根据清代舆图的绘制与存贮机制判断，一档馆所藏之图，应该是高斌等河臣呈奏给乾隆帝御览之的定本，乾隆帝御览后存贮于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后被一档馆所继承；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图应该是高斌等河臣呈奏本的副本，或是呈奏后存贮于内阁大库，或是存贮于河督衙署之中，后于清末民国年间流入民间并被美国人恒慕义（A. W. Hummel）购得，最终归入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而北大图书馆藏图则是嘉庆十三年（1808年）两淮盐务松寿根据前图摹绘而成的。

关于此图的绘制时间，北大图书馆藏《南河图说》图集的20幅图说之中，所记的最晚日期是《三滚坝天然坝蒋家闸图说》中所载的乾隆十四年（1749年）七月十三日，因此该图集所表现内容的年代肯定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七月十三日之后。又据《朱家闸引河图》图说中记载：“乾隆十一年秋汛，河臣顾琮引水放淤，地势淤高。十二年（1747年），河臣周学健于兜湾处疏挑引河，长二百七十丈。河头下唇筑坝，逼溜以趋引河，顺性下注，正河渐臻平缓。臣等查现在引河虽未告成，而三年以来，溜势通行，已分正河十分之六，值冬令水缓之时，并不停淤。”^①周学健于宿迁黄河坐湾曲流处的裁弯取直引河工程在乾隆十二年，距高斌撰绘图贴说的时间是“三年以来”，因此可知《南河图说》绘制时间约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而《王家山天然坝图》图说中所载“臣等于乾隆十三、四两年内，将天然闸口门坚堵未放，附近田禾得免于黄水淤漫之患，已有效验”，其语气中透露出的时间也应该是十三、四年之后的乾隆十五年（1750年）。综合以上记载，可以推断《南河图说》原图的绘制时间应该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

至于此图的绘制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图本身及李孝聪先生均未著明，而根据北大图书馆藏《南河图说》卷尾注“东轩高斌、西锦张师载奏辑”，可知此套图集原

图系乾隆年间的高斌和张师载绘奏。这一结论也可以从三套舆图中的图说、帖签中的文字得到证实，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图中帖签所注的“前河院靳”、“前河院张”，明显是指康熙年间的河道总督靳辅和张鹏翮，而“河院高”则明显是指乾隆十五年时任江南河道总督的高斌，一档馆藏图和北大图书馆藏图中的“前河臣靳辅”、“前河臣张鹏翮”和“臣高斌”、“臣顾琮、周学健”等称谓，也说明此图集原图系乾隆朝时任河臣高斌等人所绘制呈奏的。高斌和张师载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绘制《南河图说》，如何绘制该图集，而图说中提到的顾琮、周学健又与此图集的绘制有怎样的关系，还需要进行深入的考证。

二 高斌治河、《南河图说》之绘呈与乾隆帝首次南巡

康熙中后期以来，经过靳辅、张鹏翮等几任河道总督的悉心治理，江南黄、运堤工告成，实现了江南地区的黄河安澜、漕运畅通。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间，黄河河患中心从江南段的清口和下河地区向其上游的河南段推移。康熙之际，河南段黄河坐湾分汜严重，武陟至开封段黄河堤工频繁决溃，水灾频发。黄河河患中心的变化导致河臣的重点治理区段发生变化，康熙末年、雍正年间河臣陈鹏年、齐苏勒、嵇曾筠等人均把黄河治理重点放在河南段。黄河河患中心的转移和河臣治河重心的变化又进一步推动了雍正年间河政管理制度的改革。雍正七年（1729年）分别设置江南河道总督和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江南黄河、河南山东黄河至此正式分治。经过嵇曾筠六年的精心治理，尤其是开凿仓头口引河、雷家寺引河、荆隆口引河，对河南、山东段黄河实行裁弯取直后，河南段黄河河患基本得到了治理^②。自雍正八年（1730年）七月邳州、宿迁、桃源一

^①[清]松寿编绘：“运河图”之《朱家闸引河图》，清嘉庆十三年（1808）抄绘本，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藏。

^②关于康熙朝的河图与河政，参见席会东：《清康熙绘本〈黄河图〉及相关史实考述》，《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5期，第104—126页；关于雍正朝的河患、河图与河政，参见席会东：《台北故宫藏雍正〈豫东黄河全图〉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26卷第3辑，第126—135页。

带河决被堵塞到乾隆七年（1742年），十多年中黄河没有出现新的决口。相较之下，江南河道经过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之后几十年改移与堤防损耗，逐渐形成新的问题，再次成为河臣治理的重点区段。与此同时，乾隆帝效法祖父康熙，六次南巡，阅视江南河工、海塘，也使得江南段黄、运河成为河臣治理和河图描绘的重点。在此基础上，乾隆朝前期的河臣高斌、张师载绘制了一系列表现江南黄、运河工程的河图。另一方面，张鹏翮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绘制的《治河全书》中册装专题河渠水利图集的形式，也对乾隆年间高斌等人绘呈河工图的内容和形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高斌，满洲镶黄旗人，是清代内务府高氏家族的代表人物。他于雍正九年（1731年）任河东副总河，雍正十一年（1733年）署理南河总督。乾隆六年（1741年）调直隶总督，兼管直隶总河。乾隆十三年（1748年）因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撤职查办，高斌复任江南河道总督，至乾隆十八年（1753年）因洪泽湖决溢撤职^①。高斌先后掌理江南河院和直隶总河二十余载，对江南黄、运河和直隶永定河等河道的治理都颇有功绩，是乾隆时期最著名的河臣。

在担任河督、治理河患的过程中，高斌绘制呈送过不少河渠水利图，而且这些河图在乾隆朝的河政运作与江南黄运河治理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乾隆元年（1736年）四月，黄河由江南碭山县毛城铺闸口决溢泛滥南下，波及下游的萧、宿、灵、虹、睢宁、五河等州县。高斌奏请开浚毛城铺迤下河道，引河经徐、萧、睢、宿、灵、虹至泗州安河陡门，入洪泽湖出清口再汇入黄河。淮扬籍在京官员夏之芳等人奏言，疏浚毛城铺引河，引导黄河决溢后南泄之水入洪泽湖，会给淮扬地区带来水患，并将可能导致黄河大溜改道，因而极力反对高斌的主张。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朝中其他官员也议论纷纷。为了确定是非曲直，平息纷争，乾隆帝于乾隆二年（1737年）召高斌入京询问。高斌绘制河图呈览，陈述己见，其治理方案最终获得了乾隆帝的认可。对此情形，《清高宗实录》卷四〇“乾隆二年四月甲子”条云：

今据高斌、赵宏恩来京进呈河图，面奏

情事，乃知夏之芳等所奏，俱非现在情形。……朕披阅河图，毛城铺口门外，近年以来，刷深支河十余道。前经高斌奏明，现将毛城铺上游泄黄近溜支河全行堵闭，惟留旁流之郭家口支河一道，与下游倒勾水之定国寺支河一道，相机分泄，不令过多。^②

经过对高斌所奏河图的分析解读，乾隆帝认为毛城铺引河所泄之水比前几年多条支河并流时为少，不但不会危害淮扬，而且还可以补充洪泽湖水源，增强其蓄清刷黄的功效。高斌拟在毛城铺口门中筑乱石滚坝，可以有效避免引河刷深、黄河大溜改道。而且，高家堰在康熙朝曾屡经修筑，足以捍卫淮扬，天然坝不轻易开放，湖水就不会大量泄入淮扬下河地区，因此毛城铺引河应当开浚。乾隆帝还斥责夏之芳、甄之璜、钟衡等人结党营私、危言耸听，将三人革职查办；并令高斌与两江总督庆复估算定议，疏浚毛城铺引河。在此次纷争中，河图成为高斌陈述政见、反击政敌的有力工具和乾隆帝处理河政、判断是非曲直的重要依据。

此后，高斌疏浚毛城铺引河，开新运口、塞旧运口以避免黄河倒灌运河和洪泽湖。乾隆五年（1740年），高斌仿宋代陈尧佐之法，在黄河南岸设置两座木龙，挑溜北行，避免黄溜逼灌清口。乾隆六年（1741年），高斌又加筑宿迁至桃源、清河间的中运河南岸堤工，增筑黄河北岸遥堤，这些堤防工程都在《南河图说》中得到了反映。其后高斌调督直隶，兼管直隶总河，完颜伟、白钟山、顾琮、周学健等人相继担任江南河道总督。乾隆十三年（1748年），周学健因在太后丧期违制剃发而遭革职查办，高斌以大学士的身份再度出任江南河道总督。在此后的几年间，

^①高斌生平事迹，参见《清史列传》卷16《高斌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册，第1201—1202页；另参见清代内务府高氏家族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祁美琴：《清代内务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祁美琴：《内务府高氏家族考》，《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108—114页；定宜庄、胡鸿保：《清代内务府高佳世家的婚姻圈》，《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25—32页。

^②《清高宗实录》卷40“乾隆二年四月甲子”条，《清实录》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16—717页。

高斌先后在云梯关下二套开分水引河，修补徐州东门外蛰裂的石堤，修疏江南黄河堤防，并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陪同乾隆帝巡视江南河工，先后绘制过多幅河图。

北大图书馆藏《南河图说》中另一进奏人张师载是河南仪封人，其父张伯行曾为康熙朝的河道总督张鹏翮举荐，督修黄河南岸堤工及马家港、东坝、高家堰诸工。张师载历任扬州知府、江苏按察使、仓场侍郎，长于治河。乾隆十三年（1748年）八月，乾隆命张师载前往江南，跟随大学士高斌学习河务，后高斌奏保其为协办河督，授安徽巡抚，仍赴南河协同治河。乾隆十八年（1753年），张师载与高斌两人一起因洪泽湖决溢、下河水患而受责罚。其后，张师载又先后担任兵部侍郎、漕运总督、河东河道总督等职务，也是乾隆中期的重要河臣。乾隆十三年（1748年）至十八年（1753年）间，张师载曾佐理高斌治理江南黄、运河工，该时期不少有关江南黄、运河务的奏折都是高斌与张师载两人一起联名上奏的，而此图集也正是两人协同治理江南黄、运河时联名绘制呈送的。

《南河图说》中提到的周学健（1693—1748）是江西新建人，雍正元年（1723年）进士，历任福建巡抚、闽浙总督等职。因周学健是科举出身，故朝中多有门生故旧，与高斌也是多年好友。乾隆十二年（1747年）九月初七，周学健任江南河道总督，在不到一年的江南河道总督任内，他撰写了《治河方略》一书，并曾经绘制进奏过一些河图，其中的一些河图还得到过乾隆帝批阅指示。《清高宗实录》卷三一八“乾隆十三年七月甲午”条载：

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奏“骆马湖蓄泄机宜并移建闸座工程”。……此折着交大学士高斌，前往该处会同总河周学健逐一履勘，定义具奏。（乾隆帝）谕军机大臣等，……朕披阅河图，见峒嵒诸山尽处，骆马湖与沭河较近，因用朱笔于红花埠以下、堤头将断所在界画一道。或于此处，引湖水就近泄入沭河，令其循序渐进，其稍减湖水，功当与新添两闸等，而又可以舒六塘河之骤涨，似为有益。……今周学健初任，故不得不详悉批图阅折，为之筹画，而所见即有如许不合

之处。可见皇祖每巡视河务，不辞亲行，良有以也。^①

据此可知，周学健曾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绘呈过重表现骆马湖蓄泄机宜与移建闸座情形的“骆马湖闸坝图”，此图曾经乾隆帝的批阅，并在图中朱笔勾画，指示周学健筹建引河工程。乾隆帝认为周学健缺乏治河经验，所以详加阅图批示，从图折中发现周学健改建的工程一再拖延，拟建工程的有害无益，感慨亲自南巡阅河大有必要。乾隆帝将周学健原折和河图一并发给谙熟治河之道的原任江南河道总督高斌，让其勘验陈奏。

乾隆十三年（1748年）闰七月庚申，乾隆帝谕令军机大臣，高斌覆奏的“骆马湖东堤之柳园头及王家沟上游二处添建闸底折”中的主张前后矛盾，对时任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添建滚坝及九孔石闸主张是否妥当含糊其辞，且又对乾隆帝之前在河图中所示以沭河来减泄骆马湖水的措施是否可行未置可否，责令军机处“传谕高斌，会同周学健，按近日情形，从长妥议，详悉绘图具奏”^②。实录中的记述与北大图书馆藏《南河图说》之《骆马湖图说》中，高斌改建骆马湖东堤王家沟处五孔石闸和乾隆十三年（1748年）在柳园头建三孔深座石闸导湖济运的记载正相一致，可以证明《南河图说》是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之后绘制的，而且与高斌奉命治河有关。

乾隆十三年（1748年）闰七月戊辰，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及其属员因在太后丧期，违制剃头，触怒乾隆帝，被革职查办、抄没家产，高斌受命就近将周学健缉拿归案、押解刑部听审。因江南河道总督员缺，一时难觅通晓河务之人，遂效法雍正朝嵇曾筠以大学士兼任河道总督之故事，令高斌以大学士之衔署理江南河道总督，并特别谕令高斌不得回护其好友周学健^③，但高斌终究还是免不了被乾隆帝指责他回护周学健，因

①《清高宗实录》卷318“乾隆十三年七月甲午”条，第235—236页。

②《清高宗实录》卷320“乾隆十三年闰七月庚申”条，第267—268页。

③《清高宗实录》卷321“乾隆十三年闰七月戊辰”条，第276—27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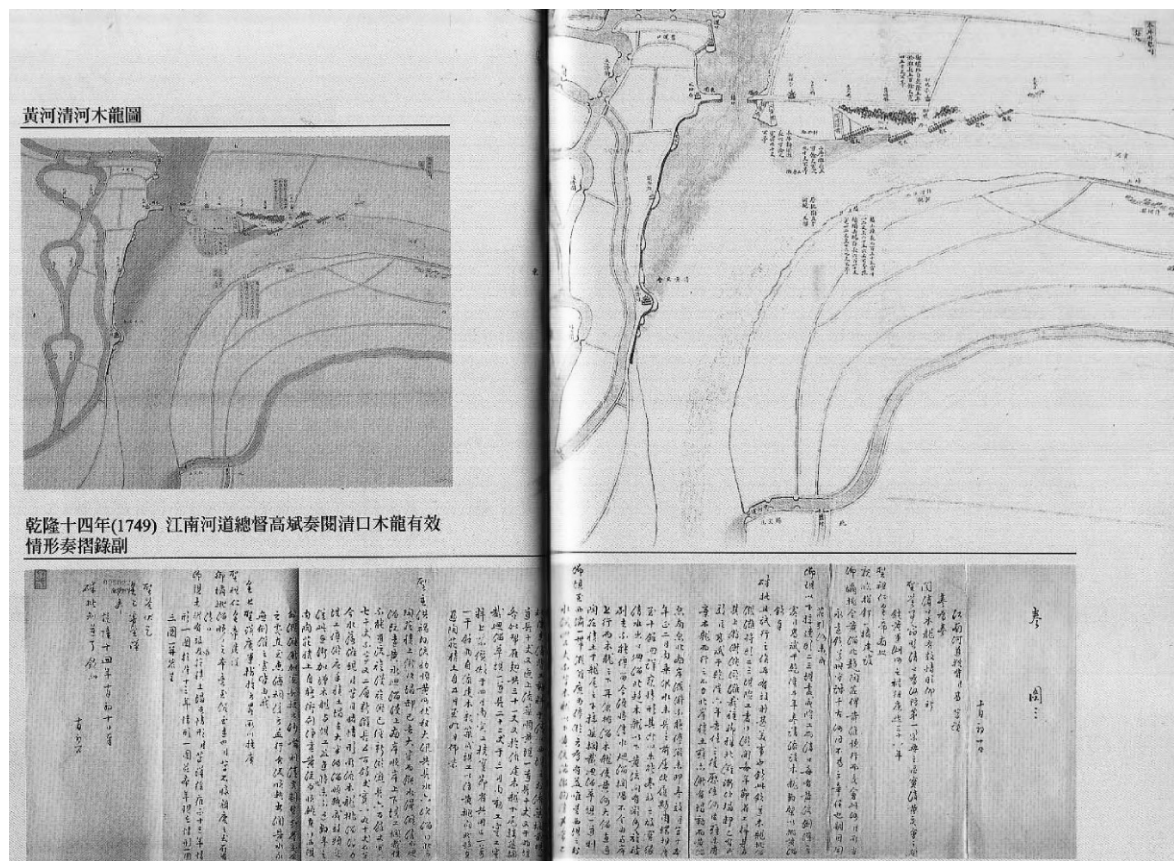


图2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高斌《清口木龙图》原图、录副图及原折录副

注：选自刘铮云编、林天人撰：《治水如治天下——院藏河工档与河图》，（台北）故宫博物院，2004年，第27—28页）

而遭受斥责。高斌与周学健曾一起勘河，筹划过江南黄、运河工，又是多年好友。因此，虽然周学健已经被革职赐死，但高斌还是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绘制的《南河图说》提到了周学健的治河事迹。

《南河图说》中提到的顾琮曾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署理江南河道总督，后调任河东河道总督，并曾与高斌一起堵筑阳武决口。因此，高斌也在《南河图说》中提及了同僚顾琮在江南河督任上的治河功绩。可以说，《南河图说》既是高斌等河臣对乾隆十五年（1750年）间江南黄、运河河情与河工的反映，也是高斌等人对乾隆朝几任江南河臣治河主张与功绩的总结。

从上述考订和分析中可以看出，《南河图说》的绘制呈送与乾隆帝的施政方略及清廷的河政运作有着密切的关系。自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江南河工告成后，黄河安澜、漕运畅通几十年，到乾隆年间，日益积累的江南黄运河问题开始重新凸显。乾隆七年（1742年），夏秋汛水大涨，黄河在江南铜山、石林决口，淮水下流泄洪不

及，洪泽湖天然坝及高邮之南关、五里、车逻等坝永闭不开，湖水无处宣泄而漫溢成灾。乾隆十年（1745年），黄河又在陈家浦决口，河臣、疆臣（地方官）与巡河朝臣（京官）的治河意见不尽相同，相互争执不下。乾隆帝效法祖父康熙的施政方略，以治河为国家要务，屡屡亲自参与治河决策^①。

在此背景下，河臣往往通过图折奏陈河务和治河主张。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月初十，江南河督高斌上奏“阅清口木龙有效情形”一折并附呈览。该图折的附图原件及其所录副件现在均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参见图2）。在此奏折中，高斌依次向乾隆帝陈奏了清口对黄运湖河治理的枢纽作用、康熙帝在清口筹建

^①关于乾隆帝南巡的研究较多，但笔者目前尚未见到涉及黄、运河图与乾隆南巡关系的研究成果。有关乾隆帝南巡与治河关系的研究，主要有徐凯、商全：《乾隆南巡与治河》，《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6期，第99—109页。

御坝的功绩、乾隆五年（1740年）高斌在清口设置木龙的由来、木龙的运行机宜及其实际成效，其后又汇报了高斌等人另行绘制清口“雍正十三年情形一图、乾隆十三年情形一图、本年现在情形一图”等三图一并呈览的情形。高斌所上的图折经录副也即抄录绘制副本后，原折及附图被呈奏给乾隆帝御览，得到了乾隆帝的朱批指示。

然而，乾隆帝虽然几次依据河臣高斌等人呈览的河图和奏折，指示河工修疏事宜，但深感自己对河道实际情况不够了解，面对歧见无法断定是非曲直，所作指示往往是纸上谈兵，难以深明机宜、切中要害，因而很有必要效法圣祖康熙帝故事，南巡阅河。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帝宣布将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首次率众南巡，时任江南河道总督高斌奏请乾隆帝效法圣祖康熙，亲临河工、指授方略。对此情形，高斌之侄高晋所编纂的《南巡盛典》卷四四《河防》云：

河道总督高斌、协办河道总督张师载“奏为民情欣慰望幸之怀河务恭请乾隆帝南巡”折内：“河工为国家重务，历来谈河务者，人各异说，纷如聚讼，莫能折衷。”“惟是水势历久，不无变迁，而修守机宜，难于胶执。…实有非敷陈章奏，所得详明，绘图贴说，所能曲尽者。兹欣逢我皇上圣驾南莅，于御道之所经由，近者顺邀睿览，仰遵指示规模。即远者，亦可就便敕委重臣前往勘度，奏请圣训。…臣等恭候钦差向导至日，当与商定鸾辂所经、御舟所由之道路，凡河工紧要工程，应恭请圣驾亲临阅视处所。…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奉朱批“览奏俱悉，钦此。”^①

高斌、张师载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所上的“恭请乾隆帝南巡”折内，先阐述河工的重要性与治河的艰难，再具体说明江南河段乃关系运道、攸关国计民生的重要水利工程，如徐州之毛城铺，宿迁之骆马湖，十字河之竹络坝，朱家闸之引河，清口之木龙，运口之改束，洪泽湖之山圩、天然二坝，高邮之东堤南关、车逻各坝，以及黄河之云梯关海口等，形势复杂，不断变迁，仅靠奏章和绘图难以详细奏明。因此，高斌

等恳请乾隆帝在首次南巡之时，效法圣祖康熙帝，指授方略，或亲临河工，现场定夺，或派重臣勘度，奏请旨意。最后，高斌、张师载奏请乾隆帝派钦差向导前赴江南，与河臣一道商定乾隆帝南巡路线及亲临现场的具体河道工程。

总体来看，高斌奏折主要是阐明恳请乾隆帝临视河工的理由及需要临视的具体工程，而折文中所述的工程也正是高斌、张师载《南河图说》中逐幅详细描绘的工程。而且，从高斌、张师载的奏折中，还可以明确乾隆帝南巡路线及经临地点的确定机制。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一月，乾隆帝亲自批复高斌的奏折，并委派钦差向导努三、兆惠等人前赴江南会同高斌等人商定南巡路线和临视工程。其详细情形，高晋《南巡盛典》卷44《河防》续云：

向导努三、兆惠奏请，乾隆十五年（1750年）三月二十四日奉旨，据河道总督高斌等奏称：……“臣等顺看附近，皇上御路之朱家闸、九里岗引河、清口、木龙、运河闸、高邮州东堤南关、车逻坝等处工程俱顺路，再高家堰最为紧要，圣驾尚可经临阅视。将此八处，入于御路营盘外。其余徐州之毛城铺、黄河云梯关海口，相距御路数百里；山圩、天然坝距高堰百里；宿迁县之骆马湖、十字河竹络坝等工程，在御营之北二十里，非住一日，不能往看。届期何项差大臣往勘之处，应令河道总督高斌等自行请旨。再有山东郯城县所属之禹王台庙，庙前所做之竹络坝，亦系要紧工程。经河道总督高斌等会同臣往看，相距御营七里余，将此已绘入图内呈览。亦俟届期差大臣往看之处，令河道总督等自行请旨”。^②

在乾隆帝所派钦差向导努三、兆惠等人所上的复命奏折中，两人先陈述高斌的奏折提议，再汇报亲临工次勘河的所见所闻，认为朱家闸、九里岗引河、清口、木龙、运河闸、高邮州东堤南关、车逻坝等处工程都系御路所经之处，而高家

^①[清]高晋：《南巡盛典》卷43《河防》，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武英殿刻本，叶一至叶三。

^②[清]高晋：《南巡盛典》卷43《河防》，叶五至叶六。又《清高宗实录》卷361“乾隆十五年三月丁卯”条与《南巡盛典》所载基本相同。

堰工程最为紧要，因此可将此八处工程列入御路营盘，由乾隆帝亲自经临阅视；其余的徐州之毛城铺、黄河云梯关海口，山盱、天然二坝，宿迁县之骆马湖、十字河竹络坝，山东郯城之禹王台庙、竹络坝等工程，离御营较远，乾隆帝不便亲临，届时可由河道总督高斌等奏请乾隆帝委派重臣择要勘度。尤其重要的是，折内还明确奏明向导大臣和河臣将上述工程一并绘入图内，呈奏给乾隆帝御览。

从向导大臣努三、兆惠的奏文来看，无论是时间、事件、人物，还是从背景和制度层面分析，向导努三、兆惠和河臣高斌、张师载等人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所绘呈的河图应该就是前文所述的《南河图说》。对此情形，嘉庆年间的河督康基田所撰《河渠纪闻》卷22引高斌的奏折也有记载，其文略云：

是年（乾隆十五年），河督高斌奏呈“河工图说”，列“修防机要二十则”。

按此因銮辂时巡，敬呈修守机宜，仰祈圣训也。疏称：……兹逢翠华临莅，必有以昭示章程，永垂法守。谨将南省黄运湖河事宜，及历年遵办之工，就目前情形，拟修防策画，绘图贴说，仰祈睿鉴，指示规模，益知遵守。^①

根据康基田《河渠纪闻》的记载可知，高斌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所奏呈“河工图说”及“修防机要二十则”奏文中，先阐述了南河的重要性，再追述了康熙帝六次南巡、亲临工次、指授方略和雍正帝发帑坚筑高家堰的治绩，又颂扬了乾隆帝历年的治河功绩，再奏明自己在乾隆帝南巡前，将江南段黄、运、湖（洪泽湖）、河（淮河）事宜及历年所修工程及现在情形、拟建工程绘图贴说，并将南河河工治理策略归纳为二十条，一并呈奏乾隆帝，恳请乾隆帝御览，并据此指授方略。之后，高斌又逐条陈述了江南黄、运、湖、河的大势、相互关联性和重要工程的功能及具体的修疏计划。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军机处折件中有高斌、张师载于乾隆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联名所上的“奏呈河工图说候圣驾巡幸阅视”折（文献编号为：005611），折中有乾隆十五年五月六日乾隆帝的朱批“图说留览”字样。从时间和内容判断，此折极有可能就是康基田所记高斌上奏的“河工图说”一折。

从背景和-content分析，高斌于乾隆帝南巡前所

上的奏折一则是为陈述河势现状和修疏机宜，请乾隆帝指授方略，再则也是为了安排乾隆帝南巡的路线和阅河的重点。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的奏折中，高斌扼要叙述了江南黄运河形势，并依次阐述了江南黄、运、湖、河重要工程的功用与机宜，全面分析了黄、运、湖、河及其相关工程之间的关联性，最后又强调了“蓄清刷黄”、“束水攻沙”之江南黄、运河的治理圭臬。高斌折文中所提到的工程与《南河图说》中的工程一一对应，若合符节。又根据台北故宫所藏高斌“奏呈河工图说候圣驾巡幸阅视”折中乾隆帝的朱批“图说留览”，可知高斌奏折附件与图留在清宫之中，因此，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南河图说》应该就是上述折文中所记乾隆十五年（1750年）四月二十六日河督高斌奏呈的“河工图说”。

乾隆十六年（1751年）正月，乾隆帝首次南巡。按照河臣高斌、张师载和钦差向导努三、兆惠等人商定的巡河路线，乾隆帝沿运河南下，至江南境内，渡黄河后，先视察了清口天妃闸、御坝、木龙，其后巡视洪泽湖高家堰、淮安城等处河工情形。高斌《南河图说》中所描绘叙述的工程，乾隆帝或是亲临巡视，或是派随行大臣阅勘。经过勘验，乾隆帝采纳了高斌于乾隆八年（1743年）和乾隆十四年（1749年）两次奏请在高家堰三滚坝外另行添建两座滚水坝的主张，以及在《南河图说》图折中的意见，认为天然坝断不可开，命人在天然坝立石“永禁开放，以杜绝妄见”，又命河臣增筑两座滚水坝，加上原有的三座，形成了仁、义、礼、智、信等高家堰五座滚坝群，称为“山盱五坝”。乾隆帝还与高斌等筹定了五坝水志（水位标尺），规定以名次为序，次第宣泄。从实际情形来看，乾隆帝第一次南巡的阅河活动与高斌《南河图说》中所记述和陈奏的江南黄、运河工一一对应，从中可见《南河图说》在乾隆帝第一次南巡阅河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总体来看，江南河道总督高斌和协办河务张师载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绘制奏呈的《南河图说》反映了乾隆前期的总督高斌、顾琮、周学健等几任江南河臣治理江南黄、运、湖、河的

^①[清]康基田：《河渠纪闻》卷22，清嘉庆霞荫堂刻本。

情形，系统阐述了高斌的治河主张，为乾隆帝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第一次南巡阅视江南河工、确定巡河路线、指授治河方略的顺利进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 《南河图说》之价值与影响

高斌绘呈的《南河图说》以江南一省的黄河、运河、洪泽湖、淮河的水利工程为描绘主题，继承了张鹏翮《治河全书》系列河渠水利图集的传统，并开创了分省专题河渠图集的形式，其表现范围、绘制技法都是乾隆前期河图的典型代表。该图集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在清代河渠水利图发展史上乃至清代地图史、河政史和水利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南河全图》反映了乾隆初期高斌、顾琮、周学健、张师载等河臣治理江南黄河、运河、洪泽湖、淮河的史实，是了解乾隆朝前期江南黄、运、湖、河情形和乾隆朝河政运作方式的第一手资料。《南河图说》图集于乾隆三十六年（1761年）被高晋辑入《南巡盛典》之中，其后又被辑入乾隆五十三年（1778年）河臣萨载和大学士阿桂等人编修的《钦定南巡盛典》之中，成为乾

隆朝河渠水利图的基础，乾隆朝后期的南河河督高晋、萨载和嘉庆时期的南河河督李奉翰等河臣所绘呈的河渠水利图集大多是在高斌《南河图说》的基础上添绘或改绘而成的。

《南河图说》是在乾隆首次南巡的背景下绘制的，反映了乾隆朝的河政运作机制与河图绘制运用方式。《南河图说》既是河臣高斌等人反映河情、陈述治河政见、彰显治河政绩的工具，也是乾隆帝了解江南河情河务与确定首次南巡行程安排的重要依据。同康熙帝南巡重在巡河治河、体察江南民生民情、绥服江南社会相比，乾隆帝的历次南巡中增添了更多的游玩巡幸色彩，但巡河、治河依然是乾隆帝南巡时所宣称的主要目的和巡视内容。乾隆帝首次南巡因治河而起，而河臣绘呈的治河奏疏与河图不但是乾隆帝南巡的重要契机和缘由，也是确定乾隆南巡路线和巡视内容的重要依据。乾隆帝首次南巡中，由河臣奏请、河臣和钦差向导大臣（朝臣）共同酌定江南巡河行程的运作方式，成为乾隆帝历次南巡的基本运作模式。在此意义上，高斌所呈奏的《南河图说》对于研究乾隆南巡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Studies on Map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Yellow River in Jiangnan Province by Gao Bin and First South Inspection tour of Emperor Qianlong

Xi Huidong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Northwest China,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Abstract: The reform of the Watercourse—governing institutions in the Yongzheng Reign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tents and mapping mechanism of the hydraulic maps. Zhang Penghe's hydraulic atlas in the Kangxi Reign also promoted the appearance of hydraulic atlas on the Yellow River, the Grand Canal, the Hongze Lake and the Huai River of the Jiangnan Province during the Qianlong Reign. Several hydraulic atlases preserved in China and abroad were all painted in the 15th year of Qianlong Reign (1750) before the first inspection tour to the South of Emperor Qianlong by the Jiangnan Watercourse Viceroy Gao Bin. The Map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Yellow River in Jiangnan Province was not only the tools for Gao bin to state his Watercourse governance opinions and achievements, but also the important base for Emperor Qianlong to make the inspection tour and find out the hydraulic situations. The painting and operation of Map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Yellow River in Jiangnan Province by Gao Bin made the pattern of inspection tour to the South of Emperor Qianlong, so it tak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history of watercourse governance politics and inspection tour to the South of Emperor Qianlong.

Key words: Map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Yellow River in Jiangnan Province; Gao Bin; Inspection tour to the South of Emperor Qianlong; Watercourse governance politics